



中西接觸後社會上的變化

黃時

一 大家庭的崩潰

「國之本在家。」所以大家庭制度，無疑的是我們中國社會的柱石。大家庭制度一有變化，其他有關聯的思想或制度，也不能不隨之轉變。

自中西接觸以後，國際帝國主義逐漸的壓倒了家庭手工業制度，衝破了農村自給經濟，於是向來在家種田做工的人，因為受了經濟的逼迫，不能不分途謀生。老大家繼承父業，老二或跑往甲城工廠做工，老三或在乙城裏面一家公司內做一個職員。老大的家眷，因為種田的關係，不消說，還須在祖宗三代的故鄉居住。老二的事情，如果穩當，便須把家眷帶出來。三嫂子的丈夫既然是公司的職員，自然可以跟着老三在城內成家立業。於是，數世同居的大家庭制度，便如此這般的逐漸起了分化作用。如果這家人家的老太爺或老太太還存在，那麼他或她只

見子女的外出，不見子女的歸來。「依門而望」這時代的老人家們，不免怏怏心痛罷！

不但經濟制度起了變化，舊思想也早已保不住了。維持大家庭制度的孔家學說，婚姻制度，貞操觀念，喪葬禮節，受了西方文明的影響，失卻了向來的權威。青年學生，在都市的學校裏面，受了新思潮的播動，首先樹起家庭革命的旗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替他訂了婚約，他認為是舊式的婚姻，不能承認。他在外面看見許多年輕美貌的女學生，比較家鄉的黃臉姑娘，多麼迷人，自然是擁護自由戀愛的思想，與心愛的人兒實行戀愛。戀愛成熟的結果，進一步用新式結婚的儀節，成立小家庭，那是很自然的。新夫人不一定是同鄉，而思想習慣又不免摩登，當然不能與家鄉的父母兄嫂同居。如是大家庭制度，只好一天一天的瓦解。

這種趨勢特別在大都市，如上海、天津、北平、廣州等處，最為明顯。因為大都市是國際資本主義的主要根據地，工商業的中心點，交通便利，

178 與西方文化最容易接觸。因此，大都市裏面，大家庭天天少，小家庭天天多。你不信，你看上海弄堂房子的建築，便知小家庭制度的盛行了。

鄉村裏面，因為交通不便，難受外面的影響，同時因為耕地的關係，不能隨便搬移，大家庭制度崩潰的速度，比較慢些。但是內亂頻仍，軍閥剝削，官吏貪污，天災流行，農民無以聊生，只有散之四方；散之四方的結果，也只有促成大家庭制度的分化。

這種趨勢已經是無可挽回的了。用不着我們去贊成，反對也是無益的，且讓我們看這種變化的結果如何。

顯而易見的，在政治方面，中國以前的政府，基礎在於大家庭。社會之所以能夠相安無事，共同生活，全靠這種家政府的維繫。所謂「家齊而後國治」者在此。現在家庭的範圍縮小了，家長無法約束他的子弟了，而同時現代國家的組織與政府的運用，又是外來的產物，不能一蹴而就。在此青黃不接時代，於是社會只有愈加紛亂了。

在道德方面，我們以前的標準，都是以大家庭為主要根據。現在大家庭制度既然站不住了，那麼有關聯的倫理道德，當然也要逐漸失掉作用。什麼「三綱」，什麼「五常」，在從前是天經地義，在現在是迂腐之談；不但青年學生不受其約束，就是稍為受過新式教育的人們，也不能接受了。同時，西方社會的道德標準如為公、愛國、互助、合作等等，又不能馬上養成。舊的不要，新的未成，結果也只有增加社會的紛亂。

二 階級的變化

我們以前的社會，分做士農工商；而其實，士是統治階級——不事生產的階級，農工商是被統治階級——生產階級。「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也就是因為士是統治階級的緣故。

不過從中西接觸以後，情形便慢慢的不同了。不但階級的地位有轉移，並且有新的階級發生了。第一是在華的外國資本家。外國的經濟侵略，不限於間接的方法而已，並且打進門來直接投資。有些經營大商業，在中國設立商店，將本國的剩餘商品，大批運來中國推銷。有些經營大工業，挾其剩餘的資本，利用中國的勞工與原料，靠着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在中國設立工廠。有些拿大大小小的輪船，在中國內河沿海，橫行直撞，把中國的航業大部分搶了過去。有些在中國開辦銀行，操縱中國的金融。甚至於有些在中國辦報，辦航空事業等等。這些外國人在中國都是發大財的。你看上海天津各大商埠，大多數坐汽車的是誰，穿華貴洋裝的是誰，住好洋房的是誰，便可明白了。這些外國資本家，挾其雄厚的資本，本國政府的勢力，在中國形成了一個太上統治階級。中國的軍閥官僚政客見到他們，也只有作揖打拱。

跟着洋大人而起的一個新興階級，便是買辦階級。因為洋大人（外國資本家）在中國有許多不便：第一是言語不通，第二是習慣不同，第三對中國情形不熟悉，所以要榨取中國人，還非要中國人做中間

人不可。這班人站在洋商與華商中間，以洋商的名義與華商交易，而取得佣金。他們的利害是與洋商一致的。洋商賺錢愈多，他們的利益愈大。中西接觸之後，外國資本家在中國的勢力，一天一天大；買辦階級的勢力也隨之一天一天大。他們現在是大都市裏面華人中最高的一個階級。他們雖然仰洋大人的鼻息，但中國的工商界，甚至於軍閥政客，還要仰他們的鼻息呢。

在從前手工業時代，我們沒有什麼大資本家；就是有，勢力也不大。自與外國通商之後，對外貿易一天一天的增加，外國製造品的輸入，與原料品的輸出，一來一往，川流不息，於是促成了商業資本家的出現。他們販賣洋貨，不遺餘力。大都市裏面，各大公司商店，那裏看不見洋貨？資本的雄厚，規模的宏大，自然非手工業時代的商人所可比擬。若你到上海，永安先施兩百貨公司參觀，便可見一斑了。不但商業上有這種重大變化，工業也復如此。帝國主義推動了中國工業革命的結果，新式工業漸漸發展，新式工廠年年增加，於是工業資本家也跟着多了起來；在紡織業，特別顯著。這些工商資本家，都是中西接觸以後的新興階級。在我們以前的社會，他們的地位是卑下的；在現在，他們卻一天一天重要，可惜他們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不能自由發展；否則更有可觀了。

談到「士」的階級，最可憐。以前「士」是統治階級，為各階級之首。自中西接觸後，他們的地位漸漸喪失了。一方面，因為政治上的變化，形成了軍閥政治，武人擠掉了文人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新式的資本

家及買辦階級因為有錢的關係，在社會上很佔勢力。講權勢，既比不上軍人；講財力，又比不上資本家與買辦，於是智識階級（士）只有一部分依附軍閥謀生，做官僚，做政客；一部分依附外國資本家謀生，做買辦做職員；還有一部分在各大中學混飯吃，過其「餓不死，吃不飽」的生活。其中有專門智識的，如律師，如會計師，如醫生，在都市中，因為社會關係複雜，人事接觸密切的結果，形成了所謂自由職業，既不屬於資本階級，也不屬於勞動階級。

工業革命的結果，不但產生了資本階級，並且同時產生了勞工階級。勞工的人數，隨着新工業的發展而增加。新開一工廠，便新吸收一批工人。其中人數比較最多的工業部門，恐怕要算紗廠、鐵路、航業、礦山等項。這些工人的地位，與以前手工業時代的工人不同。（一）以前的工人與雇主接近，並且雇主也常在一塊工作，階級的界限不嚴，彼此常能保持親密的關係。現在的工人，與資本家差不多見不到面，利害又是相反，階級的對峙自然日益尖銳，更談不到什麼感情了。（二）以前的工人，因為生活程度不高，慾望容易滿足。現在，不但生活程度增加了幾倍，慾望也因城市生活的複雜，而難於滿足。（三）以前的工人，因為是手工業，用不着機器，沒有什麼危險。現在的工人，天天同機器在一塊，稍不留心，你的手或足便會被切掉。至於工作的環境，難合衛生，更不必說了。（四）以前的工人，如果勤儉聰明，稍為有點積蓄，便可獨自營業，不必終身做他人的雇工。現在的工人，在新式工業之下，因為工廠制度與機

94180 器製造，需要鉅大的資本，絕對沒有希望升做雇主。這班工人天天被外國的或本國的資本家所榨取，除了出賣血汗，維持粗衣粗食的生計外，還能有什麼打算？

然而工人還沒有農民那樣苦。農民的壓迫是多層的：上面有土豪劣紳，又上面有貪官污吏，再上面有軍閥政客，更上面有帝國主義者。在都市，文化比較高點，消息比較靈通，團結比較容易，所以極惡毒的壓迫，還有反抗的餘地；並且保護比較周密，生命比較安全。至於在內地，農民真是孤苦無告，只有任一切壓迫階級的宰割，到了內戰更是被犧牲的羔羊。因此農村的荒涼，成了全國普遍的現象。

農村崩潰所驅出來的失業分子，城市的工廠不能完全容納，為衣食所迫，於是許多變做匪，有許多變做兵，還有許多變做娼妓，乞丐等等。

三 教育制度的改革

西洋文化早已隨着商人教士及國旗而來，耶穌教徒明末先後來中國的不少，最著名的有意大利的利瑪竇(Matteo Ricci)，西班牙的龐迪我(Diego de Pantoa)，日爾曼的湯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他們輸入的曆算智識，種下了不少新教育的種子。我國學者如徐文定、李光庵等都受了他們很大的影響。特別自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以後，教士東來傳教的更多。他們傳教的手段，便是辦

教會學校。教會學校的功罪，我們姑置不論，然對於我們的教育，有不小的影響，那是無疑義的了。

後來因為屢次戰敗，交涉很多，利權外溢，為富國強兵着想，於是同文館、機器學堂、水師學堂、電報學堂、礦業工程學堂、軍醫學堂等等的設立，以造就各種專門實用人才。這些學堂，對於教育的改革當然也有密切關係。

到了中日戰後，清廷大受刺激，變法維新運動，因之而起；興學校，廢八股，遣學生出洋留學，變更選舉制度，翻譯外國書籍，廣設報館，都是所謂新政。但不久守舊派得勢，一切改革都被推翻。等到釀成義和團之變，與八國聯軍之役，慈禧太后痛定思痛，纔知中國不能不效法西洋，毅然復下興學之詔：

「上諭：人才為庶政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學術……近日士子或空疏無用，或浮薄寡實。今欲痛除此弊，自非敬教勸學，無由感發興起。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行切實整頓外，著將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其教法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以歷代史鑑及中外政治藝學為輔。務使心術端正，文行交修，博通時務，講求實用，庶幾植基立本，成德達材，方副朕圖治作人之至意……」

這是新式教育第一次的正式宣言。

日俄之戰，日本勝利，歸功於學校教育，我國當然更受感動，於是完全把科舉制度廢除，而留學之風大開，往東洋求學者多至兩萬人左右。新式教育，更根深蒂固矣。

此後數十年間的新式教育，其間雖有許多變化，要而言之，不外：（一）學校制度代替了私塾教育；（二）由私立學校制趨向國立學校制；（三）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排斥了四書五經；（四）由男女分校到男女同學。還有一點，就是在清末，所謂新教育的基本思想，是儒家傳統的君主政治思想，而以西洋的實利主義為輔；到民國基本思想是民主主義，同時也以實利主義為輔。迨至國民黨專政，實行所謂黨化教育，思想定於一尊，像以前尊孔一樣，又必以三民主義為出發點，於是又是一個局面了。

我們的教育制度雖然與從前大不相同，但是並沒有發生很大的良好影響。一部分的原因，自然要歸咎於辦學的人；但是大部分的原因，還是因為政治環境的黑暗。第一是軍閥窮兵黷武，擴張地盤，把一切的收入，幾乎完全用到培植自己的軍力上去，不願拿點出來做教育經費，以致教員不安心於教，學生不安心於學，維持原狀還不可能，那裏能夠談到進步。第二是政治上的黑暗勢力，時常干涉教育；或是任用不學無術的私人做校長或教員；或是壓迫學術的自由，不讓教學的人自由研究；或是利用教員學生，植黨營私。於是學校裏的卑污，不下於政治界的墮敗，這樣的地方，製造出來的學生，還有什麼大的希望？

不僅如此，舊教育的遺毒還沒有消滅。我們從前的教育，目的完全為做官的。子弟讀書的志願在此，父兄鄉長的希望在此，政府科舉取士的辦法也在此。凡是讀書的都是預備做官的，做不了官的，纔去教書。所

以從前讀書人的出路只有兩條，第一是考中科舉之後做官；第二是考不中，或是考中了而沒有官做，便去教書。沒有第三條路可走。若要讀書人去種田，經商，或做工，他認為這是下賤的事業，等於女人失節，寧願餓死不願幹。

現在學校出來的學生，對於這種讀書為做官的心理，還沒有打破，尤以在內地為甚。由小學以至於大學，都是如此。他們以為小學畢業，便是以前的秀才；中學畢業，便是以前的舉人；大學畢業，便是以前的進士；若是外國留過學，便是以前的進士翰林之類；得了博士，便自以為是洋狀元了。社會之所公認，鄉長之所期望，父兄之所指靠，自己之所志願，都是做官。所以許多留學生回國，好像華僑在美國一樣，只有兩條出路，不是洗衣，便是開飯店；留學生回來，不是做官，便是當教員。做官是本來的目的，若是沒有親戚朋友的援引，而做官不成，那麼只有像以前的讀書人去教私塾一樣，去大學教書。當教員是不得已的退步辦法，猶之以前是讀書人當私塾老師一樣的退步辦法。若是官運亨通，於是馬上脫離教書生活，去做官發財，以實現原來的志願。學校不過是一個旅館，官場纔是歸宿之處！

我並不是絕對反對學生做官；其實為國家服務去做官為做事去做官，為實現主張去做官，我不但不反對，而且絕對贊成；我所反對的，是普通一般為做官而做官的心理。

我並不是看輕教書事業；其實教書在目前還是比較清高的事業，

94182 神聖的責任。我所反對的，乃是把教書看做求官不到的退步辦法。（現在也有一部分人寧願教書不願做官，這是要聲明的。）

我並不是把做官心理，完全歸罪在學生身上，其實青年總是心地最純潔的。這是一方面由於過去社會的遺傳，一方面由於現在社會的無出路。

四 留學運動與學生運動

在閉關時代，誰也想不到以我們這樣一個文明古國，要去學東西洋那班後生小子的文物制度。但是優勝劣敗，天演公例，自己不行，只有跟着別人家去跑。

中國第一個留學生是容闈。他於一八四七年往美，看見美國社會的進步，故於一八五四年回國之後，便首先提議派遣留美學生。因為曾國藩了汝昌的贊助，這個提議居然得到政府的許可，從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五年共計派了一百二十人留美。後來政府怕了這班青年完全洋化，便於一八八一年把他們撤回了。留學運動不免受一個很大的打擊。

中日之戰，日本戰勝；日俄之戰，日本又戰勝。同時中國剛敗於日本，又敗於八國聯軍，自然不能不佩服西洋文明——至少西洋的物質文明。日本既然變法維新學西洋自強了，我們又難道不能以日本做個榜樣？於是留學運動，盛極一時；尤以留日學生為最多，其特別原因大概如

下：（一）日本連戰皆勝，是變法自強的好榜樣；（二）日本距離不遠，容易來往；（三）日本生活程度很低，留學比較容易；（四）日本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與我們比較接近，容易學習。

這麼許多留學生聚集在日本，一面受了外國文明的刺激，一面脫離了家庭的牽纏，同時是血氣方剛的青年，看見滿清的腐敗，那有不氣憤填胸的道理。所以當時民主革命與君主立憲兩派都是以留日學生為基本材料。

後來（尤其是民國成立以後），（一）因為留日學生在社會上沒有顯著的成績，西洋留學生的價值，漸為社會所尊重；（二）因為日本侵略中國太利害，一班青年因為厭惡日本，而不願去留學；（三）因為一班青年不滿意間接從日本手裏去研究西洋文明，想直接去學習；（四）因為國內學校對於英語一科，極為注重，留學英美在語言文字上有相當準備；（五）因為美國退回庚子賠款一部分，創立清華學校，預備留美，每年都有一批送去。於是留學之風，轉而趨向歐美。

這班青年受了西洋文明的洗禮，對於中國社會政治自然不滿，回來以後又大半散布在各大學校裏面教書。剛好採行新式教育的結果，聚了無數千百千的學生在一塊，在思想方面容易互相交換暗示，在行為方面容易組織起來，集中力量，於是學校有如火藥庫，學生有如火藥，外國回來教書的留學生有如引子，只要星星之火，一經燃着，便可燎原。辛亥革命主持其事者是留學生，附和贊助最烈者是國內學生。他

們希望滿清推翻，民國成立，中國馬上可以富強起來。誰知國事愈鬧愈糟，先則有袁世凱的稱帝，繼則有張勳的復辟，再則有軍閥的混戰，南與南爭，北與北鬪，紛紛擾擾，每況愈下，加上歐洲大戰的刺激，日本二十一條的壓迫，一般青年，實在是煩悶已極，不免躍躍欲試。

剛好陳獨秀胡適之等起來提倡新文化運動，一面破壞舊的思想與制度，一面主張白話文學。青年的思想，得到這種空前的解放，行動只待時機的來到。

學生運動暴發的先聲，是紀念歐戰停止的那一天。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深秋天氣，有兩萬多的男女學生，集合在北平的天安門前開會紀念並大舉遊行，這是學生空前的運動，也是羣衆運動的萌芽。

我們熱烈的紀念歐戰停止，原以為公理戰勝了強權，世界永久的和平能建立在人道與正義的基礎上面；一切被壓迫的民族或國家能根據威爾遜總統的宣言，解除帝國主義的束縛；而我國所受不平等條約的壓迫，也得推翻。不料巴黎和會不顧公理，竟於四月三十日以德國前在山東的權利，轉給了日本。消息傳來，全國震動，埋伏已久的學生運動，遂於五月四日爆發。北平學生在該日遊行示威，表示反對之後，並搗毀了曹汝霖的住宅，毆傷了駐日公使章宗祥。軍警趕到拘捕了三十名左右的學生，政府想加以懲罰，各校學生便罷課表示反抗，各地團體也通電援助。政府看見輿論憤激，恐起大變，便將已捕的學生釋放，同時明令獎慰曹章陸三人，敷衍面子，並暗中逼教育總長及北京大學校長辭

職以為釜底抽薪之計。詎料學生聽見之下，更加憤慨，因為第一政府沒有答應拒絕簽約，第二對於賣國賊反而明令嘉獎，第三逼迫教育總長及北大校長辭職，第四不設法營救留日被捕學生；認為非罷課表示反對不可。於是北平各校，相繼取一致行動，並組織學生會以資團結。各地聞風而起，空氣佈滿全國。學生罷課之後，或遊街演講，或散發傳單，以與政府相抗。到六月三日，北京政府復行高壓手段，拘捕演講學生。誰知愈來愈多，拘不勝拘。加之外地風起援助，商界罷市抗議，結果政府不能不表示退讓：一面釋放被捕學生，一面罷免曹章陸三人。凡爾賽和平條約也沒有簽字，初期的學生運動便大告成功。

初期的學生運動，因為動機純粹，目的簡單，完全為愛國心所驅使，不但社會上表示同情，在步伐上也一致。成功之後，發生了下列三種影響：

(一)在學生本身方面，認識了自己勢力的偉大，以為政府都可懾服，何況其他，於是逐漸離開學生的本分，而積極從事於各種運動。自此以後，凡有外交問題發生，學生無不預預；即關於學校行政，也要求參加；以致風潮時起，權威掃地，一直至國民黨專政，施行壓迫政策為止。

(二)社會上看見學生的勢力偉大，於是羣起利用。小的利用去爭校長教員的地位，大的利用學生去爭取政權。國民黨共產黨在「五四」以後，對於此事，更特別注意，在各校裏面且有黨團之設立。自是以後，學生運動目標趨於紛歧，行動也不能一致。

(三)我們以前的政治活動，只是少數士大夫階級玩的把戲；就是戊戌政變，及辛亥革命，也沒有大批「阿斗」的參加。五四運動表現了人民對於權威不客氣的反抗。學生小子，乳臭未乾，竟敢燒部長的房子，在部長頭上動土；商人罷市，工人罷工，鬧得全國天翻地覆，政府終於罷免曹章陸。這不能不說是一大變局。這種變局，指示了民衆組織的可能，表現了民衆參政的能力。後來國民黨共產黨之所以能夠組成大黨，做各種民衆運動，匯成一九二六年起的國民革命大潮流，把北洋軍閥打得跑的跑，降的降，我們又不能不說是五四運動的影響。

五 新文化運動與白話文學

當然學生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種結果，但是同時學生運動推廣了新文化運動。

辛亥革命雖然把「真命天子」趕走，但政治上並沒有什麼成功。軍閥的專橫，人民的痛苦，一天比一天來得厲害。兼之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接着就是一九一五年日本向我提出二十一條，又接着就是袁世凱的洪憲運動；再接着是張勳復辟，解散國會，南北分裂，各處混戰。我們原來希望民國成立，五族共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誰知「真命天子」去，「假命天子」來，中原逐鹿，天下紛紛。人民的痛苦與不安，較之前清，還要利害。於是人民對於政治改革的信念，完全失掉了。剛在這個時候，新文化運動開闢新的途徑，告訴我們到社會上去，到民間去，

從下層根本問題着手，從思想革命着手，這的確替新式政治運動，展開了一種廣闊的道路，打下了深厚的基礎。摧毀舊思想，推翻舊制度，誰說不是在那裏搖動舊政治？

新文化運動並不是文藝復興，乃是對於傳統的思想與制度重新估價的一種運動。沒有價值的，便施以攻擊。因為我們中國的傳統思想與制度，大體都不適於現代生活，所以這種運動，差不多完全用力在攻擊舊勢力方面。攻擊孔教，攻擊文言文，攻擊家庭制度，攻擊婚姻制度，攻擊喪葬制度，攻擊以前的教育制度，攻擊男女不平等的關係；所有舊的倫理、道德、制度、思想，在新文化運動中，真是四面楚歌，都漸被搖動起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又是新文化運動不可磨滅的功績。

新文化運動同時促成了白話文學革命。

我們早先說過，中國文學的艱難，作文沒有一定的文法，發音沒有拼音的制度，識字又沒有字母，而且言文分開，非普通人所能了解。所以我們以前的教育，只有少數人能夠享受。讀書的人，一生精力，都葬送在磨練幾篇文章上面。至於真實的智識，則不遑研究。

學過洋文的人，不管是英文，法文，德文，或意大利文，一定覺得洋文比中文便利。第一個分別便是洋文言文相符；第二個分別便是洋文有拼音制度；第三個分別便是洋文有字母；第四個分別便是洋文的內容充滿人生的意義，不像中文的內容限於傳統思想。

我們若不想拋棄我們的國文，我們沒有方法採用字母制度。至於

拼音，以前曾有人提倡注音字母，不過沒有很大的成功。我們若是要改良中國文學，只有兩方面可以下手：一是言文合一，一是充實內容。

胡適之陳獨秀都是留學生，對於西洋文學都有相當的認識，自然不滿意中國文學。所以陳獨秀辦新青年的時候，便覺得中國文學有改革的必要。但是因為他比較對於西洋文學沒有胡適之認識的清切，所以只知道打先鋒，大聲疾呼文學改革的需要。至於具體辦法，他便沒有多少研究。胡適之中英文學都有根底，而對於這個問題，研究有素。所以文學革命的政策，只有他能夠集其大成。

文學革命的內容，如我們所說，只有從兩方面下手。從言文合一方面，他們主張拋棄文言，改用白話。從內容方面，他們主張：（一）避用成語；（二）放棄典故；（三）不用驢句；（四）廢用俗言俗語；（五）繼續用文法（以上形式）；（六）不要無病呻吟；（七）不模倣古人；（八）注意內容。

在大家都感覺到中國文字艱難的時候，忽然有人出來提倡文學革命，自然是極受歡迎。並且那時正是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時候，一班人的思想，都想解放。盡量發洩出來，若是中國文學不改革，不但有許多人不能應用文言去發表他們的意思，就是發表以後也很少人可以看懂。因此種種，白話運動自然風行。

白話運動的風行，還有一個最大原因，便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一方面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他方面普遍了白話運動及新文化運

動。因為有了五四運動，學生階級纔覺悟過來，而從事各種運動，而得到白話給予以發表意見，宣傳主張的利害工具。所以五四以後的出版物，有如雨後春筍，不勝其數。這些出版物，都是用白話寫的，因為白話比較容易。由是，白話運動隨着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進展。

白話運動的影響如何呢？

（一）因為打破了文言的權威，所以隨着打破了文言所包容的傳統思想制度的權威。我們以前說過，中國的文素來是載「道」用的，而所謂「道」，又不外乎傳統思想。像蚌一樣，文言好比這蚌的殼，傳統思想好比這蚌的肉；若是你將蚌殼打破，你自然會連帶打傷裏面的肉。所以白話運動雖與新文化運動純為二事，但是白話運動在破壞舊文化上面的確給予新文化運動一個很大的幫助。

（二）因為白話運動給了我們一種比較容易傳達思想的工具，所以解放了許多受文言壓迫的人們。智識與思想的傳播交換，更廣更快，我們看五四以後所出的雜誌，數目驚人，便知白話的功用的浩大了。

（三）白話又給教育一個大的貢獻。我們以前的教育因為文言的關係，教授非常繁難。現在有了白話，學生容易進益，讀三四年書差不多便可寫白話信，這是多麼一個利具！因為發現這種利具，所以平民教育運動，得了一個很大刺激，而勇猛向前推展。

六 社會標準的紛亂

新文化運動只注重消極方面的破壞，沒有注重積極方面的建設。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人，雖然對於舊的東西很勇敢的進攻；對於新文化的本身，卻很少具體的貢獻。其在思想上的意義，與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意義倒很相同。辛亥革命運動只知推翻滿清，沒有充分準備推翻以後的辦法，所以滿清一倒，民主政治並不能實現，中國的政治更趨於紛亂。新文化運動也是一樣，雖摔碎了許多傳統的思想與制度，但是對於新文化卻缺乏有系統的建設。結果，社會失卻舊日所賴以維繫的東西；解放了的民族精力，無處歸宿，而發生很大的紛亂，不能收拾。

我們先從人的精神住居來看。不消說，舊倫理，舊道德標準圍我們失了。忠君則無君可忠，孝父母則於小家庭的實行有礙。講貞操，則不能自由戀愛。諸如此類，都可以證明舊的標準，已經不能維繫人心。

在風俗習慣日用起居上，更可看出顯明的變化。大菜在通商口岸是流行了。洋裝城市到處可以看見。有錢的人非住洋房不可。有馬路當然要有汽車相配。電影，留聲機，無線電，跑狗，跑馬，都是新的把戲，成了時髦的嗜好。所謂女人的美，如曲線，如盪髮，如畫眉，如染指，如長統絲襪，如高跟底鞋，都不是原來我們的標準。結婚喪葬，中樂鑼鼓之外，加入西樂，也是中西參合的結果。外面穿馬褂長袍，裏面穿西式襯衣及洋褲皮鞋，

也是應有的現象。至於冰結凌，巧格糖，咖啡，紅茶，牛乳之屬，不與西洋交通，我們也不知享受。火車，輪船，飛機，電話，電報，電燈，以至於抽水馬桶，無一不是西洋文明之賜。

於是，我們的嗜好，慢慢變了；我們的風俗習慣也慢慢變了；我們的觀念與標準又安得而不變？以前我們坐紅木椅子，現在我們要坐沙發。以前我們沒有什麼耶穌聖誕，現在有一部分人每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要照例熱鬧一番。以前誰高興去看賽球，現在卻有成千成萬的球迷。以前以多生子女為榮幸，現在的青年卻要夫人保持容貌的美。以前弟子認老師神聖不可侵犯，現在學生對先生普通不打招呼。

如果完全的洋化，未始沒有一定的標準。但是幾千年的文化，那裏這麼容易完全取消。舊的東西雖然在動搖，在崩潰，卻仍然掙扎着。在沒有產出一種新文化以前，只有成功現在這種不中不西，又中又西，中西混雜的現象。穿西裝的先生，可以扶乩。摩登的太太可以在觀音娘娘面前跪拜求子。連號稱革命的前輩，可以發起時輪金剛法會。那麼研究無線電的人信鬼，也是勢所必然的了。

這樣的一個社會，安得而不矛盾？安得而不紛亂？

